



中國通商口岸

貿易與最早的條約港

THE CHINA COAST

TRADE AND THE FIRST TREATY PORTS

廖樂柏 (Robert Nield) 著

李筱 譯

中國通商口岸

貿易與最早的條約港

THE CHINA COAST

TRADE AND THE FIRST TREATY PORTS

廖樂柏 (Robert Nield) 著

李筱 譯



主編
責任編輯
版式及封面設計

潘翎
莊玉惜
嚴惠珊

書名	中國通商口岸——貿易與最早的條約港 THE CHINA COAST — TRADE AND THE FIRST TREATY PORTS
著者	廖樂柏 (Robert Nield)
譯者	李筱
校訂	姜竹青
出版	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Eastern Centre,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K.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龍華街道辦三聯社區龍苑大道聯華工業園
版次	2010 年 6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 32 開 (140 × 210mm) 27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988-0 ©2010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目錄

1 序言	6
在關口的歐洲人	
2 葡萄牙人	18
3 荷蘭人	32
4 英國人和廣州時代	42
5 戰爭與《南京條約》	66
口岸	
6 廈門	92
7 廣州	120
8 福州	148
9 香港	174
10 寧波	200
11 上海	224
鳴謝	252
圖片授權聲明	254
參考書目	255
索引	266

中國通商口岸

貿易與最早的條約港

THE CHINA COAST
TRADE AND THE FIRST TREATY PORTS

廖樂柏 (Robert Nield) 著
李筱 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主編
責任編輯
版式及封面設計

潘翎
莊玉惜
嚴惠珊

書名	中國通商口岸——貿易與最早的條約港 THE CHINA COAST — TRADE AND THE FIRST TREATY PORTS
著者	廖樂柏 (Robert Nield)
譯者	李筱
校訂	姜竹青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Eastern Centre,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K.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龍華街道辦三聯社區龍苑大道聯華工業園
版次	2010 年 6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 32 開 (140 × 210mm) 27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988-0 ©2010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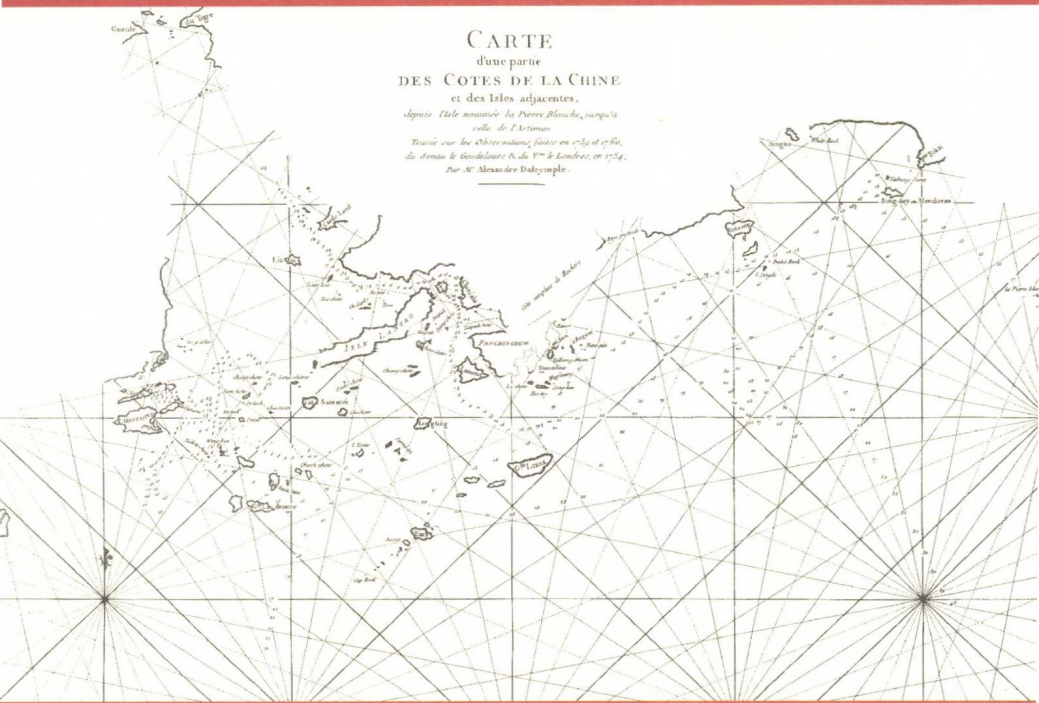
中國海岸圖，圖中標示的為本書敘述的主要地點。

目錄

1 序言	6
在閩口的歐洲人	
2 葡萄牙人	18
3 荷蘭人	32
4 英國人和廣州時代	42
5 戰爭與《南京條約》	66
口岸	
6 廈門	92
7 廣州	120
8 福州	148
9 香港	174
10 寧波	200
11 上海	224
鳴謝	252
圖片授權聲明	254
參考書目	255
索引	266



1



英國海軍首位水道學家亞歷山大·道爾林普 (Alexander Dalrymple, 1737-1808 年) 於 1780 年繪畫的廣東河口地圖。對資料不詳的海岸線，他選擇了留空而不作瞎猜。

序言

古代中國的對外通商之路共有兩條：陸上的商隊和海上的商船。「商隊」一詞容易讓人聯想起那條連結着中國與波斯古絲綢之路上的駱駝與車隊；惟本著作命名為《中國通商口岸》，似乎較多地暗示重點是海上貿易，那些來自海外的貨物與商人，尤為關注飄洋過海先後抵達東海與南海的歐洲商船：最初到來的是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抵埗，接續是荷蘭人於十七世紀到來，最後英國人在十八世紀中期之後大舉進入。中國沿海港口見證了中外海上貿易的發展。

相對而言，這些歐洲人其實是遲來者；早在他們之前，亞洲內部已經有一個非常繁榮的地域性商貿圈。最早可追溯至唐朝（618-907年），懷着對中國商

（左頁）永樂皇帝（1403-1424年在位）下令進行偉大航海活動出使東南亞，甚至遠至非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身穿奇裝異服的馬可孛羅
(1254-1324年)。



《天工開物》中關於繅絲
工藝的木板畫，該書於
1637年出版。

品的渴求，朝鮮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波斯人紛紛來到中國。當年的對外貿易集中在南部沿海和長江下游的幾個少數大港，由當地的市舶司掌管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初時廣州是最主要的貿易口岸，之後是泉州，即馬可孛羅筆下的阿拉伯名字「Zayton」，意即桐城。當時，外商須待在指定港口，嚴守該國法律，這與後來治外法權沒有什麼兩樣（詳見第四章）。

馬可孛羅詳細記錄了十三世紀晚期的中國社會，蒙古人建立的帝國控制了中亞的貿易路線，為類似馬可孛羅這樣的歐洲旅行者提供便利。懷着征服世界的雄心壯志，元朝憑藉前朝（宋朝）積累的海上實力，一度派遣遠征軍攻打日本以及爪哇。不過，中國在海上的實力卻要至明朝永樂年間（1403-1424年）始達到頂峰。人們至今還記得這位皇帝命令鄭和將軍帶領龐大船隊下西洋的事蹟。鄭和史詩般的航行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黃金和白銀帶到了東南亞、印度、斯里蘭卡（即錫蘭）和阿拉伯半島，甚至非洲東岸。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透過擴展朝貢制度至遙遠國度，來擴大中國的政治影響。與此同時，通過朝貢制度，凡承認中國中心地位及霸權的國家，可享有在中國經商的獨有貿易權，從而確立中國的優越感。

鄭和去世後，朝廷停止了對海上貿易的支持。永樂皇帝將京城從南京遷至北京，在那裡，朝廷能夠

更密切地防範來自蒙古邊境持續的威脅。朝廷對於蒙古人（他們曾是中國的征服者）的戒備，遠遠大於對海上事務投放的資源。1450年後，朝廷對於南方海外交流的興趣降到了低點，這並不是說海防高枕無憂，恰恰相反，來自日本的海盜（中國人稱其為「倭寇」）勾結內陸奸民在沿海地區進行掠劫。朝廷試圖通過海禁來維持秩序，這樣一來，與外國人私底下進行的貿易頓變為非法，海禁令商人成為走私犯，進出口變為非法走私。這就是1513年，葡萄牙人經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海峽抵達中國南部海岸所面對的情景。

後來，海禁解除。滿人於1644年建立大清帝國，他們對海上貿易的矛盾情緒卻未見得較諸明朝為少。統治最初四十年，內亂不止，加上1661年對沿海航運的全面禁止，海外貿易嚴重受挫。滿人用了數十年始徹底平定內亂，頭號敵人鄭成功（歐洲人稱為「國姓爺」）誓死忠於明朝，清朝必欲除之而後快。

鄭生於日本，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日本人。他在廈門組建了一支海軍，當福建海岸失守退居台灣後，他一舉把荷蘭殖民者驅逐出台，並在那裡建立抗清海軍基地。為了與之抗衡，清朝下令浙江、福建和廣東等沿海省份和附近島嶼居民內遷，剩下荒蕪的城鎮和村莊；為斬草除根，清廷還切斷了鄭成功的軍需補給線，此舉令苟延殘喘的海上貿易蕩然無存。事情



國姓爺昂然地由他的所在地廣東離岸小島南澳的堡壘向外望。祺力高攝（Nicholas J. Kitto）。

要到 1663 年清朝攻克台灣後始有轉機，航道重新開放，中國與歐洲之間的直接貿易才有機會恢復。

從那時起到大約 1759 年，歐洲人開始在廈門、泉州、廣州、福州和寧波等幾個港口進行海上貿易。然而，清廷仍然對海上貿易抱懷疑態度，擔心會再出現像鄭成功那樣的海事力量，沿用的對外政策仍是通過限制對外交流來換取穩定，於是乾隆皇帝下令將所有對外貿易局限在廣州。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在 1759 年以後的八十多年中，廣州會成為外商船隻進行合法貿易的唯一港口。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戰敗的滿清政府與大英帝國於 1842 年簽署了《南京條約》。根據條約規定，除廣州外，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也成為英國對華直接貿易的「通商口岸」。



乾隆皇 (1736-1796 年在位)。

回顧歷史，鴉片戰爭強行加給中國的顯然是自由貿易，這也是簽署《南京條約》的目的，為此，西方不惜動用武力。換言之，中國是被迫推行自由貿易、履行國際貿易的承諾；在這之前，清廷和士大夫階層對此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們自認為「天朝地大物博」，往往是外國人更熱衷於貿易。

隨着《南京條約》的簽署，其他西方列強也以「利益均沾」為借口，紛紛倣效。兩年後，清朝被迫同法國、美國簽署了類似條約。英、法、美三國的條約為不平等條約制度奠定基礎，此制度亦隨着日後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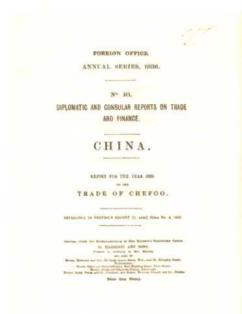


1842年簽署的《南京條約》。

多不平等條約的出現而有所擴充。越來越多通商口岸被迫開放：截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總共開放了七十五個通商口岸，有些雖然被稱為「口岸」，實際上遠離大海，甚至距離可供航行的河流數以千米之遙。本書重點則是最早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關注幾個世紀以來在那裡或其附近進行的貿易活動及經營方式。香港雖然不屬於通商口岸的範疇，鑑於因《南京條約》的一項條款割讓給了英國，所以也包含在此書中。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也稱為亞羅戰爭——詳見第七章）結束時，清朝與列強簽署了《天津條約》，接着簽署的《北京條約》甚至割讓香港島對面的九龍半島給英國。之後，英法聯軍用武力進一步為西方世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在謀求商業利益的同時，傳教士亦相繼湧入。鴉片戰爭的失敗令中國備受凌辱，充分暴露清朝的積弱，而觸發清廷走向滅亡的，最明顯不過是反清、排外叛亂活動的勃興，主要是太平天國（1850-1864年）與義和團（1895-1901年）的叛亂。

太平天國之亂前後持續了十四年，三千萬人喪生。太平軍在中國南方勢如破竹，並在南京建立了都城。1853年，時任香港總督般含爵士（Sir George Bonham）造訪南京，與太平天國達成協議，允許西方人在太平天國轄區內自由活動。太平軍試圖攻打上海，均被英法聯軍擊退。有鑑於此，上海商人出資贊



芝罘現稱烟台，於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後成為通商口岸。



戈登少校正在激勵印度兵。鮑德溫項目(The Baldwin Project)提供。

一幅當代漫畫活現中國對於「最惠國待遇」所表現的反感。維多利亞女皇、德國皇帝、俄國沙皇、法國共和國國君及日本天皇，看來正貪婪地分割那肥美而多汁的餡餅——中國。



助、組建了一支洋槍隊「常勝軍」，協助軍心渙散、裝備落後的清朝軍隊鎮壓太平軍。第一任洋槍隊隊長美國人華爾(F. T. Ward)，後來在寧波附近陣亡；隨後，英國人戈登少校(C. Gordon)接任。此時太平軍已節節敗退轉入防守階段，1864年戈登率軍一舉攻克南京。

十九世紀末期，清朝內部腐敗不堪，加上列強環伺，國家遭受極端屈辱。英、法、德、日、俄等國都在積極地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雖然只有同中國接壤的日本與俄羅斯熱衷於侵佔領土，其他國家更感興趣的是如何爭奪商業利益。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一個自稱「義和團」的組織萌生於山東。由於義和團的尚武風習，他們又被稱為「義和拳」，宗旨是消滅洋人、「驅除洋教」。頑強不屈的南非農民令強大的大英帝國大傷腦筋的消息，大大鼓舞了義和團信眾的士氣，雖然他們把滿族同歸於「外人」一類，但在他們眾多的口號中，卻有一句「扶清滅洋」，故此主要的攻擊目標還是歐洲人以及國內的基督徒。義和團的信仰紛繁蕪雜，包含很多迷信以及宗教元素，包括堅信自己刀槍不入。結果當然令人失望。入京後，義和團開始圍攻外國駐華使館，當時大多數的外國人都聚集在那裡。這時，慈禧太后決定對「洋人」宣戰，藉以平息義和團的怨氣和造反

的意圖。繼較早前一次救援失敗後，1900年8月，由兩萬名英、法、日、俄、美等國士兵組成的聯軍最後解開重圍。1901年9月，經過多輪談判，清朝和列強終於簽署了《辛丑條約》。許多人認為該條約有關賠款的條款過於嚴苛：對戰爭中外國人生命與財產損失的賠償金額竟達到了當時中國財政收入的兩倍之多。

鴉片戰爭的失敗讓中國蒙受恥辱，隨後敗給新興的軍事力量——日本——更讓情況雪上加霜。1894年，中日雙方為爭奪朝鮮和台灣的控制權，爆發了甲午戰爭，日本軍隊出人意料地獲勝。此後，日本開始認為自己新建的軍隊戰無不勝。1904年，為掠奪東北的資源，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再次獲勝，這使得它躍升為第一個戰勝西方強國的亞洲國家。

接二連三的危機越發讓清朝政府的統治難以為繼。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清廷統治，為中國第一個共和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這些歷史事件在本書僅輕輕帶過，因為此著作重點乃着眼於中國沿海口岸的商貿活動。1907年，中國84%的航運、34%的棉紡和全部鋼鐵生產都控制在外國人手裡。時屆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西方列強甚至控制了更多的戰略物資，包括至少93%的鐵路。通商口岸成為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及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灘頭陣地，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已經淪為半殖民地。



表述義和團奉行「義」、「和」為宗旨的一幅圖像。



慈禧太后（1835-1908年）。